

明清吴中与浙东文学的互动

——以文章批评与选本为中心

张何斌

【摘要】明清的吴中与浙东两地在文学领域体现出地域优势，同时又具备辐射全国的力量，明初的浙东文人宋濂更是具有超越宗派、引领一代的影响力。在他之后，不同地域文学各自发展，吴中归有光、王世贞等以自己的理论创作影响文坛，钱谦益更是努力秉守正脉，努力融合不同地域传统的优势，为明代文学的总结与清代文学的开拓做出贡献。黄宗羲与清代全祖望等浙东后学在继承地域传统的同时，也对吴中等地文学进行了批判学习。两地文人在继承各自道统、文统的基础上就学术、思想等多方面问题进行了不断探讨，在不同历史时期又根据各自时代的特点提出新的见解，从而推动了中国文学不断发展。

【关键词】明清 吴中 浙东 文章总集 黄宗羲 全祖望

作者张何斌，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南京 210023）

明清时期，吴中与浙东两地可谓经济文化的重镇。前者大致指古代苏州府所辖地域，包括常熟、太仓、昆山等县治，后者则因居钱塘江之左得名，含宁波、绍兴、金华、温州等府。在明清两代，两地的科举、文学等方面尤为发达，具有相当可观的作家数量与创作成就，体现出显著的地域优势，而又具备辐射周边、影响全国的力量。其中，活动时间跨越明清的钱谦益、黄宗羲及私淑后者的全祖望等，在承传本地域传统、总结并发扬前人文学思想创作等方面有极其重要的贡献。对这些人物的思想与创作实践进行分析梳理，结合相关文章总集对作家作品的选录接受情况，可以见出两地在明清文学发展史上的互动交融及在全国文学版图中的突出意义，从而为相关时段历史、社会研究提供独特的视角。

一、吴中文人与浙东文统的交汇

常熟钱谦益作为吴中后学，对有明诸前辈尤其是本地域文学传统有很好的继承发扬。加上他个人的才学与在政坛、文坛的身份地位，他对明清文学的走势也体现出巨大的影响力。不过，由于在易代之际的变节行为，钱谦益不免遭到遗民群体中不少激进者的批评指责。他自身的文学理论与创作也有值得商榷之处，这就引发了更多人对其进行反思批判，从而对明代文学的得失与清代文学的发展有更深入的认识。

浙东文人在明朝政权确立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宋濂、刘基等都是重要的功勋元老。尤其是宋濂，除了其重要的政坛地位，他也被奉为开国文宗。比如，明代“后七子”的代表王世贞就曾评价说：“国初之业，潜溪（宋濂）为冠，乌伤称辅。”^①王世贞等文学复古派主尊秦汉之文，对近世文人，除本群体内成员互相称颂外，少有推许，由此也可见宋濂的影响力。

“宋濂可以说是明清文学史演变的意义特别的标尺之一。”^②宋濂对个人的影响，更见于钱谦益的论述中。他曾称“余之从事于斯文，少自省改者有四”，其中一点正是提到汤显祖启发他学习宋濂：“午、未间，客从临川来，汤若士寄声相勉曰：‘本朝文，自空同（李梦阳）已降，皆文之舆台也。古文自有真，且从宋金华着眼。’自是而指归大定，三也。”^③在其它文章中，他更是将宋濂与吴中前辈归有光并提，强调他们对自己转变的重要意义：“中年读潜溪、震川集，少知持择，始改轶易辙，思自拔于流俗，望古之人之质的而超之。”^④与钱谦益交好的顾苓也称其“周规折矩，不失程量，远轨昌黎、眉山，近准潜溪、震

川。”^⑥钱谦益对归有光十分推崇，而除此之外得其称许者也多是承传归有光余绪的嘉定文人。应该说，地域情结极强的钱谦益推崇宋濂，就像归有光等人对这位开国文宗的尊奉一样，本就是一种超越门户的行为。杨维桢在为宋濂文集所作序中称其“‘试不售，则辄弃去，曰：‘吾文师古，则今不谐。吾宁不售进士第，毋宁以程试改吾文也。’此其学日古，文日老，非今场屋士之以声貌袭而为者比也”，^⑦加上稍后的方孝孺等在文学、精神气节等方面对明代士人的影响，以宋濂为宗的浙东文统在明代长期占据重要地位。

不只钱谦益，明清之际文坛另一位重要人物太仓吴伟业也对宋濂无比推崇。他曾说道：“自黄潜、柳贯以经术倡起婺学，而宋公濂用其师说，首开一代之文治，后二百余年，巨公硕儒，后先辈出，终未有驾文宪而出其上者，盖穷经适用，甚矣实学之难也！”^⑧他特别指出，这种文学上的问题，根源仍在学问、思想方面。在这方面，嘉定王鸣盛的一番分析颇有深意：

明自永（乐）、宣（德）以下，尚台阁体，（成）化、（弘）治以下，尚伪秦汉，天下无真文章者百数十年。震川归氏（有光）起于吾郡，以妙远不测之旨，发其淡泊不收之意，扫台阁之肤庸，斥伪体之恶浊，而于唐宋七大家及浙东道学体又不相延袭，盖文之超绝者也。^⑨

王鸣盛指出了明代文学发展中台阁体陈腐僵化、复古派又徒事摹拟等弊病，由此引出对本地域前辈归有光的称许。除了赞赏他对文学注入的新鲜血液外，强调其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不为特定派别、师法对象所囿，尤其在思想内容上没有受制于“浙东道学体”。言下之意，宋濂以后，不同地域文学传统也有着各自的发展。与吴中文坛相比，浙东之文就体现了更为浓烈的道学气，而这多少会损害文学的健康发展。在文坛百家争鸣的局面下，吴中文学自身的传统便开始显现优势。

博学好古是吴中文人的一大特点，比如钱谦益，虽然有强烈的地域观念，但具体到文学领域，只要是符合他理念的，宗法上并没有那么狭隘。武进唐顺之虽属常州地区，但理论创作等与归有光颇具相似之处，被后人同归入“唐宋派”，也深受钱谦益的推崇。他曾在文章中将两者并举，强调了他们的异曲同工之处：

荆川（唐顺之）之指要，虽与金华（宋濂）稍异，其讲求实学，由经术以达于世务则一也。世之为科举进士之业者，以帖括诵法荆川，为应举之资而已。而钩章棘句之徒，又从而訾訾之。荆川之集，已束之高阁不观，而况荆川以上者乎？^⑩

讲求实学，穷经适用，由经术以达于世务，正是唐顺之和后世为了应试为文而对唐顺之等人作品进行摹拟效仿之徒的重要区别。更有甚者，某些人甚至没有好好读过唐顺之等的文章，却反唇相讥，攻讦诋毁。反过来看，唐顺之、归有光及在他们之前的宋濂等，在为人、为学、为文等方面的矩度精神一脉相承，正是钱谦益所尊奉的正宗，而他也以传承与集大成者自诩。或许也是看到了这种一脉相承，浙东后学黄宗羲在《明儒学案》里，也为唐顺之安排了一席之地。而对于吴浙两地文人士大夫在世运国势风雨飘摇之时的核心地位，吴伟业指出：“往者门户之见，始于讲学，而终于立社，其于人心世道有裨者，实赖江南、两浙十数大贤以身持之。”^⑪言下之意，在明末学界文坛坛坫林立、流派纷争的乱局下，钱谦益等为核心的吴中前辈，能与两浙后学一道秉承明初宋濂等浙东文人开创的正脉，肃清乱象。“先生（钱谦益）论明文，前祖宋文宪（濂），后宗归太仆（有光）。盖二公不为专家之学，各蓄经世之志，先生所窃自比也。”^⑫钱谦益继承并发扬前辈精神，更自期青出于蓝。在这一背景下，吴伟业对这位吴中同好的尊崇也毫不吝嗇：

至古文辞，则规先秦者失之模拟；学六朝者失之轻靡；震川（归有光）、毗陵（唐顺之）扶衰起敝，崇尚八家；而鹿门（茅坤）分条晰委，开示后学。若集众长而掩前哲，其在虞山（钱谦益）乎！^⑬

吴伟业无情批驳了文学复古派中部分人流于形式剽窃的肤浅行为，而以归有光、唐顺之、茅坤等通过师法唐宋之文而上达六经子史的路径为正道。由此，承传这些前辈余绪的集大成者钱谦益，也就成了他和许多人眼中明清文学承前启后的桥梁。钱谦益作为吴中文学的集大成者，更因承传了宋濂等开创的文统而成为融合地域传统、超越门户的一代文学结穴。钱谦益个人的理论创作乃至品行等都还有可议之处，但这种影响力是无法忽视的。

二、由明文总集看吴浙之文

前文所论，涉及明代归有光、王世贞等吴中作家和宋濂、刘基等浙东文人，以及唐顺之等因理论观念相似而不受地域所限的紧密联系者。除此之外，由于两地文坛中钱谦益、吴伟业、黄宗羲等活动时段跨越明清两代的重要人物的贡献，吴中与浙东文统在相互影响中共同繁荣，并有力引导着明清之际文学嬗变的走势。

如果说上述两地代表性文人的批评话语是文学思想的集中阐述，作品选集则是对他们理念的具体呈现。选集之中，由于古代较早形成的“以诗存人”的传统，诗歌总集在发挥收录文人功用时往往不能完全反映具体作品传播、接受的实际面貌，而一些关于特定文章文体（如八股时文）的选本也常常因其专而使读者难以得见作家创作的完整性。加上宋濂、刘基与归有光、王世贞以及唐顺之等人的文学活动结束后明朝尚未灭亡，故编选时间过早的总集亦不足以代表有明一代文章。就存世的总集来看，编纂于清初的选本最具有观照明代文章创作的价值。这一时段本身就是明代诗文总集编纂的高峰，编选者大多在明清两代都有一定的活动时间，熟悉并努力对明代文学、文化进行总结与反思，重要作品的利用更是成为了存一代之史的宝贵文献。

这一背景下，以钱谦益为代表的本身在理论创作中就有重要地位的明末清初文人，他们编选的明代文章总集尤具意义。关于钱谦益通过编纂明文总集引导文坛风气的努力，时人王时敏就曾评说：“闻牧翁（钱谦益）杜门，专力选国朝文集，悬示指南，使服习者知所趋向，砭俗学而起大雅，厥功甚伟，非独珠林玉圃，为钜丽之观已也。”^⑨可惜的是，钱谦益尝试编选的总集未能留存，后人只能经由他在不少文章中发表的言论及他编纂的包括他为入选之人撰写小传的明代诗歌总集《列朝诗集》来体会他的文章学思想。相比钱谦益，编选的多种明文总集都得以大致完整传世的黄宗羲，他的文章学思想就在理论文献上得到了双重反映。黄宗羲自身理论创作暂且不论，此处先分析他编纂的三种总集。加上另外几种清初明文选本，分析其中收录吴中、浙东作家作品的情况，能使两地文坛的繁盛状况和对明清文章学演进的重要意义得到揭示。以下先简要介绍本文选取分析的几种清初明文总集的概况：

（一）《明文案》，黄宗羲编，后遭到抽毁，主要以不同钞本的形式流传，有国家图书馆编《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958-961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版）、《四库禁毁书丛刊补编》（第44-47册，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据浙江图书馆藏清钞本）等影印本，存卷一至卷一百一十四、卷一百二十五至二百一十七；

（二）《明文海》，黄宗羲编，亦因收录钱谦益等人作品故，今存虽经补遗，已非本来面目，有中华书局1987年据原涵芬楼藏钞本、《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三九二总集类，第1453-145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等影印本，存约四百八十卷；

（三）《明文授读》，黄宗羲编，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400册，齐鲁书社1993年版，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张锡琨味芹堂本）等影印本，六十二卷；

（四）《山晓阁选明文全集》，清初嘉善隐士孙琮编，有《四库禁毁书丛刊补编》（第49、50册，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据北京大学、山东省图书馆藏清康熙二十年（1681）刻本）等影印本，正编二十四卷续编八卷；

（五）《明文英华》，清初吴江顾有孝编，有《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34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据天津图书馆藏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传万堂刻本）等影印，十卷；

（六）《明文在》，清初常熟薛熙编，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408册，齐鲁书社1993年版，据辽宁大学图书馆藏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古渌水园刻本）影印本、任继愈主编《中华传世文选》（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标点本等，一百卷，其中卷四至十八为诗歌。

以上六种总集，编者既有浙东黄宗羲这位自身理论实践在学界文坛有巨大影响者，也有顾有孝、薛熙等努力通过总集编纂传承前辈文学的吴中后辈，以及孙琮一类看似别具一格者。选本的编纂，受制于编选者的眼光及可利用文献，本就带有一定偏向性与偶然性，比如黄宗羲的三种选本中，每一种其实都存在未被其它两种所选入的作家。一人之选尚且如此，涉及不同地域、宗派的选家编纂的总集，其间自然也多少存在各方面的差异。但恰恰因为如此，分析这些选本得出的共性就尤其具说服力。

首先，在入选作家所涉地域方面，虽然资料的可靠性、人员的流动性使这方面难以一概而论，但由总体看来，籍里属今苏、浙、赣、闽的始终居多，且前两地排序非一即二，而苏州一府，即吴中地区，体现出明显优势，浙东也较浙西为胜。六种选本共涉及约9319篇文章，960位作家，选人文虽各有差异，但有31人的作品为所有选本选入，前文论及吴中归有光、王世贞、浙东宋濂、刘基及唐顺之等悉数在列。此外，尚有吴中高启、桑悦、王鏊、文震孟、浙东苏伯衡、胡翰、王祿、方孝孺、王守仁、陶望龄等。这些人不全以文称，各选本收入作品数量亦不尽居前，但毕竟体现了普遍的认可度。

具体到作家个人，刘基《苦斋记》、王守仁《象祠记》与《瘞旅文》三文为所有选本选入，浙东文坛更因明初文宗宋濂和方孝孺入选篇目的稳居前列而占据了不可撼动的地位。即便在收归有光文章最多的《山晓阁选明文总集》和《明文在》中，这两位也位居三甲。而在浙东后辈黄宗羲的三种选本里，他们更是占据了头等重要的两个位置。

当然，如前文所论，从选入作家作品的倾向性也能见出选家本身的宗尚。黄宗羲尊崇两位浙东前辈自然可以理解，对同样颇为文坛认可的归有光却似乎并没有特别好评，所选其人文数量甚至还不如同样被归为“唐宋派”的唐顺之和王慎中。不管怎样，从以上选本的编纂、收入作家作品的情况本身可以看出吴中与浙东两地在明代文章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而浙东后学黄宗羲经由编纂总集而做出的努力，更使浙东文统在易代之际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和发扬。

三、黄宗羲对吴中文学的批判学习

黄宗羲编选明文总集，虽包含弘扬浙东文化的倾向，但主要还是对一代文章整理总结，并在此基础上存史修史。他和众多浙东后学也因在学术领域的巨大贡献，虽然在清代没有再出现宋濂一类宗主式的人物，却将地域传统延续了下去，直到晚近仍是中国社会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在这个意义上，黄宗羲对明代文章学的集成与反思、他个人在文学理论创作方面的成就，便同时具有开创清代文学文化新局面的意义。再加上他与钱谦益的密切联系，通过分析黄宗羲对钱谦益以及他代表的吴中传统的态度评价，联系对易代之际政局、文化、士人心态等方面的认识与思考，能更好地观照黄宗羲等浙东文人对明清文学转型、发展的意义。

黄宗羲早年即酷爱读书，虽屡试难第，但科举考试毕竟对文章形式有所限制，难免会黜落不少英才。而像黄宗羲这样学问精深、志向高远的人，即便不能由应举之路开启飞黄腾达的仕途而实现价值，他的抱负与能力也不会轻易被埋没。他自己就曾提及一次落第后的经历：

庚午岁，余自南都试回，遇公（文震孟）于京口，遂下公舟，以落卷呈公。公见余后场，嗟赏久之，谓后日当以古文鸣世，一时得失，不足计也。⁹

文震孟是吴中文坛的佼佼者，也是在政坛颇具名望的要员，黄宗羲父亲黄尊素的神道碑铭更是由他所撰写。黄宗羲编选的三种总集，也都收录了这篇《黄忠端公神道碑铭》。在两家有这层关系的情况下，黄宗羲特别强调这位前辈对身为后辈的自己的赏识鼓励，就显得饱含深情。的确，一个下第的举子能亲身登上高官先达的船并呈上一份被黜落的试卷而得到称赞，即便是劝勉多于真正的认可，对黄宗羲而言总是一番能终身铭记的珍贵回忆。而黄宗羲后来在诸多方面的种种成就，也确实没有辜负文震孟的厚望。

“（黄宗羲）初师钱谦益，颇得其笔。”⁹像当时的很多文人一样，年轻的黄宗羲对承传了浙东宋濂、吴中归有光等不同地

域、众多前辈学术与文学传统的文坛领袖钱谦益颇为认同。而因为东林党后人的身份，黄宗羲也多少参与了政治色彩浓厚的复社等文人活动，跟钱谦益也多了一分亲近。钱谦益对他也十分欣赏，不仅曾于文债难酬之际迫其代作，更尝以墓志铭相托，显有衣钵传承之意。

不过，黄宗羲虽然也学习钱谦益，却并没有像其他许多文人一样丧失自己的识见判断，而始终坚守着独立的考量立场。比如，“归有光一派本于六经、取法于史、非假古董等方面的特点，是与黄宗羲的主张相合的。”^⑨归有光等不为科举体制所囿，扎根经史之学，也不像复古派中某些徒然摹拟古人之文形式的行为，而是努力学习前贤与经典的真精神，这是钱谦益等许多吴中文人推崇的，也是黄宗羲本身就认同的，和他对钱谦益的尊敬与学习无关。“钱谦益是站在以归有光为代表唐宋派一边，而黄宗羲则站在明初的宋濂、方孝孺一边。当然两人最终是殊途同归，都要求返经还古，从经术中求，到文章中去。”^⑩在看似一致的宗法背后，其实隐含二人对各自地域传统的继承与发展。浙东学术、文学自有渊源，而宋濂不仅是浙东文宗，归有光等吴中文人也会尊奉学习的开国文臣之首。黄宗羲曾言：“当王（世贞）、李（攀龙）充塞之日，非荆川（唐顺之）、道思（王慎中）与震川（归有光）起而治之，则古文之道几绝。”^⑪他肯定归有光等人对古文之道的承继之功，而他们承继的仍是宋濂等浙东文人开创的文章统绪。在这一点上，黄宗羲所秉持的文脉似乎占据了一个更高的地位。也正因为此，黄宗羲学习但不迷信钱谦益，循着自己的路径走出了同样宽广的道路。

黄宗羲对晚明以降学界文坛的混乱局面十分不满，曾直接批评道：“当今之世，士君子不可为者有二，讲学也，辞章也。”^⑫在他看来，“士君子”是一种值得珍视的身份，应该在文学、学术、政治等多方面体现出自己的价值，不应专攻小道，更不可与庸庸之徒混作一团。关于“讲学”，涉及包括佛学论争在内明代理学史上诸多问题，于此暂不多谈，重点来看“辞章”。

黄宗羲并无关于“辞章”内涵的专门论述，但结合他论人衡文的整体观念看，他并不是否定文学创作的意义，因为他自身也有数量可观的诗文作品传世，他要否定的是那些在形式内容上价值不大却会损害社会人心的文体和创作行为。身经社稷倾颓、朝代鼎革，他对此尤其敏感和痛恨。比如，他在《作文三戒》中，就以“当道之文”、“代笔之文”和“应酬之文”^⑬为创作时应该避免的，而在《砚铭》一文中，他也托物言志，强调“毋酬应而作，毋代人而作，毋因时贵而作。宁不为人之所喜，庶几对古人而不忤。”^⑭从这些话语中能明显看出黄宗羲对酬应、代作、奉命之作等的反感，也能见出他耿介的性格。

耿介如黄宗羲，甚至会在给别人的寿序中也批评应酬的问题，比如在《张母李夫人六十寿序》中他称“应酬之文，知文者所不为也。颂祷之间，此应酬之尤者。”^⑮而关于应酬之文特别是其中寿序的弊病，他在另一篇寿序中有所谈及：

近日古文道熄，而应酬之所不能免者，大概有三，则皆序也。其一升迁贺序。假时贵之官阶。多门客为之：其一时文序，则经生选手为之；其一寿序，震川（归有光）所谓横目二足之徒，皆可为之。盖今之号为古文者，未有多于序者也；序之多，亦未有多于寿序者也。其多之所以至于如此者，求文之家，不识古文词为何物，无所差择，不过以为夸多斗靡之资。^⑯

黄宗羲首先指出这是一个古文正道倾颓的时代，而应酬之文的兴盛正是文道衰败的体现。像其中的升迁贺序，便是他所反感的“因时贵而作”。而这类创作泛滥的背景，是众多文人不再潜心经史典籍，甚至只靠些时文册子来揣摩八股技艺，以期应举仕进，由此学界、文坛的风气不断恶化，世态人心也显现出不良的状况。他接着提及归有光对寿序的批评，强调序文尤其是寿序的泛滥正是“古文道熄”的表现。颇有意思的是，归有光的这番言论，也是在给他人的寿序中发出的：

东吴之俗，号为淫侈，然于养生之礼，未能具也；独隆于为寿。人自五十以上，每旬而加，必于其诞之辰，召其乡里亲戚为盛会，又有寿之文，多至数十首，张之壁间。而来会者饮酒而已，亦少睇其壁间之文，故文不必其佳。凡横目二足之徒，皆可为也。予居是邑，亦若列御寇之在郑之鄙，众庶而已，故凡来求文为寿者，常不拒逆其意，以与之并驰于横目二足之徒之间，亦以见予之潦倒也。^⑰

归有光的后学娄坚也曾指出“吾吴之俗，自年六十以上率十年而一祝，则必侈为文辞以待万年之觞”，^⑱可见当时在吴中地

区祝寿贺序的风气已很盛行。归有光身为吴中人士，对地域文化中这种奢侈铺张的风气十分反感。黄宗羲所言“求文之家，不识古文词为何物，无所差择，不过以为夸多斗靡之资”，即由归有光“而来会者饮酒而已，亦少睇其壁间之文，故文不必其佳”之叹引申而来。不过，归有光由于久试难第，长期偏居乡隅，靠教书勉强糊口的同时，也就不得不时常卖文为生。但是，归有光的这些“应酬”，“既有对时政世态的规讽，又有对同年、后辈的劝勉鼓励，虽说是为应酬而作，但不失立言之旨”。^⑨对此，黄宗羲也表示理解：“顾寿序如震川（归有光），而可以应酬目之乎？”^⑩

黄宗羲对归有光的态度是辩证的，虽然并未给予他第一等的评价，但编选的总集也收录了他包括这篇《陆思轩寿序》在内的不少作品。而当时间来到黄宗羲自己所处的时代，在明末国难当头、政局危亡的形势下，曾为归有光所批评的问题更俨然成了不祥之兆。徒事辞章之士，也就成了黄宗羲口诛笔伐的对象，如他在为别人寿诗中所写：“平生不作应酬文，征启何曾入见闻？……知君好士喜文人，试问文人若个真？七十年来所见者，可怜空费此精神！”^⑪此诗作于晚年，仍不减耿介锋芒。而在这些对应酬之文的批评背后，又隐隐体现着黄宗羲与大力推尊归有光的钱谦益在为人为文方面的区别。

相比归有光，钱谦益的才学似乎更胜一筹，仕途更是远为顺利，身上喜交际、好铺张的文人习气也因为交游的广泛、各类活动的频繁而愈发突显。他是东林领袖、文坛宗主，即便有易代之际的变节行为，身份地位不减，求文索序者仍络绎不绝。人的才思精力毕竟有限，据说某次因人索文甚急，钱谦益只得将登门拜访的黄宗羲锁在书房，迫其为己代作三篇。从中虽可见出钱谦益对黄宗羲的器重，后者并非情愿亦是事实。钱谦益更曾向黄宗羲托以身后墓志铭，不过钱谦益之子并未遵父之愿，而是另择龚鼎孳作。对此，黄宗羲为自己免于是非而庆幸，也显示了他对钱谦益尊敬之余在文学等许多方面的保留态度。^⑫

比如，在《明儒学案》这部学术史著作中，黄宗羲也就相关人物的文学造诣提出了与钱谦益的不同见解。钱谦益曾批评自己的吴中前辈黄省，“吴中诗文一派，前辈师承，确有指受。正（德）、嘉（靖）之间，倾心北学者，袁永之（袞）、黄勉之也”，^⑬“国初以来，中吴文学，历有源流。自黄勉之兄弟，心折于北地（李梦阳），降志以从之，而吴中始有北学。”^⑭王士禛也对相关批评记载道：“黄省曾，吴人，以其北学于空同（李梦阳），则摈之；于朱凌溪应登、顾东桥璘辈亦然。”^⑮黄宗羲则坚持自己的观点：“钱牧斋（谦益）抵牾空同（李梦阳），谓先生（黄省曾）倾心北学，识者哂之。先生虽与空同上下其论，然文体竟自成一家，固未尝承流接响也，岂可谓之倾心哉！”^⑯既入选《明儒学案》、文章又同时为黄宗羲三种总集收录的，仅有王守仁、胡翰、陶望龄、方孝孺、徐阶、唐顺之、焦竑、罗伦、霍韬、薛瑄等10人，其中4人来自浙东，而只有黄省曾是吴中文人，黄宗羲对他的肯定显而易见。

又如，对于明代“性气诗”的代表庄，钱谦益多有批评：

孟旸（庄）刻意为诗，酷拟唐人，白沙（陈献章）推之，有“百炼不如庄定山（）”之句。多用道学语入诗，如所谓“太极圈儿，先生帽子”，“一壶陶靖节，两首邵尧夫”者，流传艺苑，用为口实。而丰城杨廉，妄评其诗，以为高出唐人，杜子美“穿花蛱蝶深深见，扑水蜻蜓款款飞”，比定山“溪边鸟讶天机语，担上梅挑太极行”尚隔几尘。此等缪种流入后生八识田中，真所谓下劣诗魔，能断诗家多生慧命，良可惧也！^⑰

“刻意为诗”且竭力“酷似”的行为，本身就是钱谦益常指斥的，“多用道学语入诗”则更为其所反感。钱谦益对前人对庄诗歌的推崇颇为不屑，连带也批评了与庄关系密切的理学大家陈献章。黄宗羲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不同意见，称“先生（庄）之谈道，多在风云月露、傍花随柳之间，而意象跃如，加于乐天（白居易）一等。”

钱牧斋（谦益）反谓其多用道语入诗，是不知定山（庄），其自谓知白沙（陈献章），亦未必也。”^⑱钱谦益的批评正为庄诗中的道学气而发，但这恰恰是黄宗羲所看重的部分，由此也能见出二人在学术、文学观点上的分歧。正如嘉定黄淳耀评价唐顺之诗文时说：“《荆川集》送到。此老是欧（阳修）、曾（巩）嫡派。集中诸杰作，如《读〈春秋〉》、《周襄敏公传》、《叙广右战功》，不能指其何字何句是古，而逼真古人。惜其得意处流入近时道学一路，然谈理亦多发明。诗则必不可法，文可谈理，诗不专谈理也。”^⑲黄淳耀的评价尚可商榷，但作为吴中文人不喜为浙东文人重视的唐顺之文中的道学气，也多少是地

域传统使然。

就特定对象提出不同见解还只是一种间接批评，黄宗羲更曾直接指出钱谦益自身创作的问题：“钱牧斋揜当世之疵瑕，欲还先民之矩矱，而所得在排比铺张之间，却是不能入情。”^⑨“排比铺张”，恰恰正是为顾苓所欣赏的钱谦益文章的一大特征。

作为欣赏黄宗羲的文震孟的外孙，顾苓对钱谦益的文章称赞道：“铺张扬厉，振动激昂，区明忠烈而电掣霜飞，洒耻发潜而天愁鬼泣。”^⑩但是，这种风格却为黄宗羲所反感。黄宗羲肯定了钱谦益揭示文坛弊病、复兴前辈理想规矩法度的努力，但也认为他的创作实践不能与这种愿望相符。后世郭象升也就钱谦益创作实践中的问题感叹道：“牧斋（钱谦益）胸罗四库，旁通九流，才情艳逸，固凤洲（王世贞）之匹；持论虽正，观其所作，亦不能确守其言，得无仅为坛坫之争哉！”^⑪

“不能入情”，结合黄宗羲与钱谦益二人分歧看，更多黄是对钱身上喜欢应酬唱和的“文人”气的不满，也认为他由于没有承传为浙东学人所看重的理学精神而使文章在思想内容上有所缺失。黄宗羲曾分析归有光文章的长处说：“然震川（归有光）之所以见重于世者，以其得史迁（司马迁）之神也。其神之所寓，一往情深，而纾回曲折次之。”^⑫得神而入情，是归有光得黄宗羲肯定之处，也是钱谦益的不足之处。刘咸忻指出，“论文主情是浙东绪言”，^⑬又进一步解释说：“所谓至情，即切时、切事而至者。”^⑭结合黄宗羲所论，亦多少可见地域传统的体现。

站在回顾、反思整个有明一代的层面上，黄宗羲结合对几位重要人物的评判总结道：

弇洲（王世贞）、牧斋（钱谦益），好丑相半。上下三百年间，免于疑论者，宋景濂（濂）、唐荆川（顺之）二人。^⑮

钱谦益尊奉归有光的同时贬抑王世贞等前后“七子”，但在黄宗羲看来，钱谦益自己的理论创作也是得失参半，就整体成就而言未必超过他所批评的对象。相对钱谦益以及他的前辈归有光、王世贞这些吴中文人，黄宗羲显然更看重浙东文宗、开国文臣之首宋濂，以及传承发扬了理学传统的唐顺之，这些是为数不多为他所认可的明代人物。在黄宗羲的三种文章总集中，浙东前辈宋濂、方孝孺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而唐顺之文章的收录数量也稳居第三位。

他们体现出的共性，借用钱谦益的话说，是“讲求实学，由经术以达于世务”，而这正是黄宗羲看重的学术、文学的正道。相比黄宗羲一再强调作为有明一代道统、文统当之无愧开创者的宋濂，唐顺之又只是一个好的承传者而已，归有光、钱谦益等吴中文坛的杰出代表值得肯定之处就更少了。在对这些本地域之外优秀文人批判学习的同时，黄宗羲通过努力实践，传承并发扬浙东传统，在朝代鼎革之际确立了他所认同的明代文学正宗。

四、全祖望对前人的反思

作为黄宗羲在浙东的后学，全祖望是清代前中期学界文坛又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颇有意思的是，他虽然生在清代，距离黄宗羲去世都已过了一段时间，实际上并未受过黄的直接影响和教导，却对明清易代之际的史事人物充满兴趣。他对钱谦益、黄宗羲等前辈为人、为学、为文等方面以及他们所代表地域传统的思考认识，对世人颇具启发意义。

虽然身上带有一种遗民般的正直气节，在分析看待事物时，全祖望却不像有些遗民一样激进极端，而较为理性客观。比如，在对待崇祯皇帝坚守北京终至自缢煤山而亡的问题上，全祖望在《明毅宗南迁论》中写道：“事有万不得已，则与其偕亡，不若暂为迁幸以谋兴复，四方亦谅我之衷，而不遽谓非也。”^⑯全祖望肯定危机时刻的变通，不赞成盲目的牺牲，支持对有生力量的保存。这其中，多少也含有对易代之际包括钱谦益在内一些人“变节”行为的理解，或至少是同情。

对于钱谦益的降清之举，全祖望确实没有直接尖锐的批评，但这不表示对他行为的完全认同。比如，全祖望曾联系钱谦益和吴伟业这两位出仕清廷的前明文坛重要人物评论道：“予尝谓近人如东涧（钱谦益），（庾）信之徒也；梅村（吴伟业）则

颜氏之徒也；同一失节，而其中区别矣。”^⑧吴伟业是在满清统治已经确立的情况下不得已出仕，也在诗文作品等多方面表现了忏悔情绪，世人也多表示理解。

相比之下，钱谦益才名更盛，更是南明弘光朝的礼部尚书，主动开城迎降即便是为了使南京百姓免遭屠戮，却成了不可饶恕的行为。而不论他人如何评说，在仕清之后，钱谦益虽因遗民群体的攻讦时常流露出一些羞愧懊悔，但总的趋向是顺应时势，专注于实干，在自身得以保存的情况下努力为明代文化的整理总结做出贡献，同时还在暗中支持反清复明的活动。这当中复杂的动机不得而知，但入清后钱谦益在学术史、文学史等方面创造了新的成就，也是不争的事实。

钱谦益不容埋没的贡献，使全祖望对他不乏欣赏，甚至因此在文章中为他的行为作出过辩解。比如，他又曾将钱谦益与另一位降清出仕的前明著名文人龚鼎孳并提道：“钱尚书失身于柳如是，龚尚书失身于顾媚，以一妓而坏名节者，盖有之矣。”^⑨当然，将“变节”的原因归咎于女性的影响，并因这些女性并不为主流社会认可的出身而对她们加以贬低，并不是解释历史人物行为的应有态度。

对钱谦益的人品行径，全祖望持理解的保留态度，相比不少极端看法已属平允客观。而具体到对钱谦益文学思想与创作实践的评价，他也能实事求是，不以人废言，对钱谦益的得失作出了尽可能客观的判断。比如，黄宗羲认为钱谦益“掎摭当世之疵瑕，欲还先民之矩矱，而所得在排比铺张之间，却是不能入情”，全祖望也指出了“蒙叟（钱谦益）力追八家，而累于排比”^⑩的问题。钱谦益尊奉包括黄宗羲、全祖望的浙东前辈宋濂所代表的明代文章正统的努力是他们一致认可的，但他文章排比铺张的弊病也为二人同样诟病。关于钱谦益相比前人的不及之处，全祖望曾联系宋濂、归有光等指出：

明初集大成者惟潜溪（宋濂），中叶以后，真伪相半。虽最醇者莫如震川（归有光），亦尚在水心伯仲之间。独蒙叟（钱谦益）雄视晚明，而拟之潜溪，逊其春容大雅之致，此又有随乎国运而不自知者。语曰：“文章天地之元气”，岂不信哉？^⑪

一句“集大成者”，便将宋濂抬高到前代文章统绪传承者的地位。全祖望所持似是文学退化论，认为随着国运世道的衰颓文学也难与前代相比。因此，无论是归有光还是将其精神发扬光大的钱谦益，相比宋濂总差了一截。而关于“文章天地之元气”，归有光和黄宗羲都曾有过相应表述。前者曾说：“余谓文章，天地之元气。

得之者，其气直与天地同流。虽彼其权足以荣辱毁誉其人，而不能以与于吾文章之事。”^⑫后者则称“夫文章，天地之元气也。元气之在平时，昆仑旁薄，和声顺气，发自廊庙，而鬯浹于幽遐，无所见奇。逮夫厄运危时，天地闭塞，元气鼓荡而出，拥勇郁遏，忿愤激讦，而后至文生焉。”^⑬在归有光看来，文章之事世人自有评判，真文章的价值不会因为作者人生的顺逆及一时毁誉而改变。这种态度，正支撑着归有光走过困厄的一生。吴江朱鹤龄就此阐释说：

归太仆（有光）又言：“诗文者，天地之元气。”……若夫得元气者，西清东观之间，振其步武。明堂清庙之上，戛其声音。煌煌乎，山龙藻火之采烂焉。琅琅乎，璆璜冲牙之响发焉。惟其受之于天者全，故凡音不得与之竞工拙也。^⑭

而从黄宗羲的角度，太平盛世时廊庙台阁的春容大雅之致尚显现不出文章作为天地元气的力量，反而是在国运倾颓的末世更能彰显真文章的价值。作为易代之际的遗民，黄宗羲深谙世事剧变带给文人及其创作的正面影响，也从中看到了崩塌的社会下不灭的精神。

全祖望引用这番话语，当是对归、黄二人理念均有所吸收。不过，从他钱谦益与宋濂所作对比看，明初的盛世与宋濂作为开国文宗的“春容大雅之致”仍是他更为欣赏的。“随乎国运而不自知”，也隐隐体现出全祖望对明代由盛而衰直至灭亡历程的叹息。

由以上言论也可见出，全祖望虽然同样承继浙东文学的传统，也将宋濂置于有明文章正宗的地位，但就文学史上具体问题

的见解而言，却也与浙东前辈黄宗羲有所区别。就像黄宗羲敬重、学习但不迷信于钱谦益，且对他的为人为文有批判反思，生长于清朝统治下的全祖望过着比黄宗羲更安稳的生活，身上的学者气似乎也更多，也以更加平允客观的视角去看待这位与钱谦益基本生活在同一时期也体现出一些“随乎国运而不自知”的相似问题的前辈。

相比黄宗羲，全祖望持更为通达的见地，因此对黄和钱谦益等人所处时代文人多少带有的偏狭习气表示了不满。“门户之见，始于讲学，而终于立社。”晚明以来，不同政党、文社等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也成为了耗尽明朝气运的重要因素。如张履祥所言，当时“东南坛坫，西北干戈，其乱于世无所上下”。^⑧可以说，文人间论争产生的危害并不亚于战乱。黄宗羲也曾批评晚明文坛学界的宗派问题说：“才学把笔，不曰吾由何（景明）、李（梦阳）以溯秦、汉也，则曰吾由二川（荆川、震川，即唐顺之与归有光）以入欧（阳修）、曾（巩）者也。党朱（熹）、陆（九渊），争薛、王，世眼易蔽，骂詈相高。有巨子以为之宗主，则巨子为吾受弹射矣。”^⑨黄宗羲甚至意识到浙东地域文化中一些消极因素：“万历以来，排摈诋厚，出而杀君子者，多自浙人。盖由宋至今，沿之为俗。故朝廷之上，成之为党，遂使草野之间，讲之为学。”^⑩上到朝廷政党，下至草野讲学，最终仍指向了文人的坛坫之争，这种风气是黄宗羲所反感的。话虽如此，但黄宗羲与钱谦益颇为相似的一点，就是具有较强的地域观念，加上也多少参与党争及文社活动等，就也不免显现出或多或少的门户之见。全祖望曾有诗曰“门户纷纶祸未休，可怜文字亦戈矛”，^⑪表达了对门户斗争的痛恨，并曾引用黄宗羲弟子郑溱的话说：“然慈溪郑平子曰：‘梨洲（黄宗羲）门户之见太重，故其人一堕门户，必不肯原之。此乃其生平习气，亦未可信也。’予颇是之。”^⑫过重的门户之见，会使人对非本宗派者过分苛刻，而少了一分客观平允。对于黄宗羲这方面的弊病，全祖望还有更深入的批评：

惟是先生之不免余议者，则有二：其一，则党人之习气未尽，盖少年即入社会，门户之见深入，而不可猝去，便非无我之学。其一，则文人之习气未尽，不免以正谊、明道之余技，犹流连于枝叶，亦其病也。斯二者，先生殆亦不自知，时时流露。然其实为德性心术之累不少。苟起先生而问之，亦必不以吾言为谬。过此以往，世之谤先生者，皆属妄语，否则出入仇口也。^⑬

正像黄宗羲评价钱谦益为“好丑相半”，全祖望也直接将明初以降文学发展的局面总结为“真伪相半”。而若是“雄视晚明”的钱谦益在全祖望眼中相比宋濂都少了“春容大雅之致”，同样“随乎国运而不自知”，他对浙东前辈黄宗羲也就难有更高的评价。如同钱谦益身上同样带有的习气，全祖望认为黄宗羲“不免余议”的原因是“党人”、“文人”的特征。

“流连于枝叶”的重要表现，便是黄宗羲自己所强调的“士君子不可为”的“讲学”和“辞章”，但这恰恰也是他人生学术、文学历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活在同一个时代，难免沾染上相似的习气，黄宗羲对钱谦益一些方面的弊病提出了批评，但自己身上同样的问题，黄宗羲“殆亦不自知，时时流露。然其实为德性心术之累不少”。由此，黄宗羲本人思想创作中的一些缺失也可从这方面得到解释。当然，既是为了婉转维护浙东前辈的尊严，也多少显示自己观点的可信，全祖望强调“过此以往，世之谤先生者，皆属妄语，否则出入仇口也。”

颇有意思的是，全祖望的弟子董秉纯，也是他文集的编订者，似乎对其师的理论与创作持一定保留态度。不过，他并没有多作评判，而是尽可能保留先师著述的原貌。他谦逊地称：“盖淘汰以归粹精，予既非其人，则与其芟薙窜削，使荡为飘风，湮为野蔓，无宁仍存细篋，藏之名山，以俟后之虞山（钱谦益）之于震川（归有光）而已矣。”^⑭先后相承，学习并发扬前辈的优良传统，而又保有自己独立的见地，由此进行批判反思，推动学术、思想、文学等不断发展，是对前人真精神的传递。也正是因为敬重、学习而不迷信黄宗羲等前人，全祖望能较为清楚地看待他们在学术、文学上的得失，在吸收地域内外优秀传统的基础上为学术史、文学史等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结语

明清经济的重镇吴中与浙东两地，在文学领域也体现出地域优势，这点在各种关于明代文章的总集中即有所体现。浙东文人宋濂除了因开国功勋具备重要的政坛地位，也被奉为一代文学的正宗，具有超越门户宗派的影响力。在他之后，不同地域文学有着各自的发展。吴中文人归有光、王世贞等以自己的理论创作影响着文坛，钱谦益更是在易代之际学界文坛坛坫林立、流

派纷争的乱局下，秉守正脉，努力融合不同地域传统的优势，为明代文学的总结与清代文学的开拓完成了集成之功。

浙东后学黄宗羲对吴中文人钱谦益也不乏敬重与学习，却并未丧失自己的识见判断，在对多少带有好铺张、应酬等成分的吴中等地文学进行批判学习的同时，更着力继承与发展浙东传统，努力实现道学与文学的结合与发展，道统与文统的融汇与延续。他的后辈全祖望虽然同样承继了浙东文学的传统，将宋濂置于有明文章正宗的地位，但比黄宗羲少了些党人习气与门户之见，对文学史上具体问题的见解也和他有所区别。全祖望对钱谦益人品行径的态度较为平允客观，对他文学理论创作也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对于黄宗羲在学术、文学等方面的得失，全祖望也能较为清楚地看待。

从明初浙东的宋濂到晚明归有光、钱谦益等吴中文人，以及黄宗羲与清代全祖望等浙东后学，虽然涉及吴中与浙东两大地域，却有一种内在的脉络紧密贯穿，背后是对道统、文统传承下关于学术、思想、文学等方面问题的不断探讨。如清初吴江潘耒言：“窃谓明代名家，如宋金华（濂）之浑厚，方逊志（孝孺）之英爽，吴匏庵（宽，长洲人）之淳深，王文成（守仁）之明达，唐荆川（顺之）之纾徐，归震川（有光）之简洁，钱牧斋（谦益）之雄博，黄陶庵（淳耀，嘉定人）之坚凝，是皆天地元气。”^① 在与地域传统相关而又不局限于此的背景下，后学对前辈进行学习、继承与批判反思，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又根据各自时代的问题提出新的见解，从而推动了中国文学与中国社会不断前进。

（本文系浙学论坛2019“青年学者浙学研究优秀论文奖”获奖论文，本次论坛由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浙江师范大学主办。）

注释：

①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四库提要著录丛书》集部第119册影印明万历五年（1577）王氏世经堂刻本，北京出版社2010年版，第162页。

②何宗美、刘敬：《明代文学还原研究：以〈四库总目〉明人别集提要为中心》，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61页。

③钱谦益：《牧斋有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588页。

④①钱谦益：《牧斋杂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600、968页。

⑤③顾苓：《塔影园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3、13页。

⑥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495页。

⑦⑩⑫吴伟业：《吴梅村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087、1088、1087页。

⑧转引自沈新林《归有光评传》，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47页。

⑨钱谦益：《牧斋初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120页。

⑬王时敏：《王时敏集》，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年版，第273页。

⑭⑤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39、260页。

⑬ 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224页。

⑭ 李圣华：《黄宗羲“明文正宗”说的文学史思考》，《中州学刊》2016年第5期。

⑮ 冯小禄、张欢：《流派论争：明代文学的生存根基与演化场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21页。

⑯ ⑰ ⑱ ⑲ ⑳ ㉑ ㉒ ㉓ ㉔ ㉕ ㉖ ㉗ ㉘ ㉙ ㉚ ㉛ ㉜ ㉝ ㉞ ㉟ ㊱ ㊲ ㊳ ㊴ ㊵ ㊶ ㊷ ㊸ ㊹ ㊺ ㊻ ㊼ ㊽ ㊾ ㊿ 黄宗羲：《黄梨洲文集》，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54、371、482、506、508、506、156、354、403、320、340页。

① “观此铭而其人如见已。”金埴：《不下带编》，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41页。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⑪ ⑫ ⑬ ⑭ ⑮ ⑯ ⑰ ⑱ ⑲ ⑳ ㉑ ㉒ ㉓ ㉔ ㉕ ㉖ ㉗ ㉘ ㉙ ㉚ ㉛ ㉜ ㉝ ㉞ ㉟ ㊱ ㊲ ㊳ ㊴ ㊵ ㊶ ㊷ ㊸ ㊹ ㊺ ㊻ ㊼ ㊽ ㊾ ㊿ 归有光：《震川先生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335、21页。

② 娄坚：《学古绪言》，《四库明人文集丛刊》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92页。

③ 杨峰：《归有光研究》，复旦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第75页。

④ 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1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70页。

⑤ “甲辰，余至，值公病革，一见即云以丧葬事相托，余未之答。公言顾盐台求文三篇，润笔千金，亦尝使人代曹，不合我意，固知非兄不可。余欲稍迟，公不可，即导余入书室，反锁于外。三文，一《顾云华封翁墓志》，一《云华诗序》，一《庄子注序》。余急欲出外，二鼓而毕。公使人将余草牒作大字，枕上视之，叩首而谢。余将行，公特招余枕边云：‘唯兄知吾意，歿后文字，不托他人。’寻呼其子孙贻，与闻斯言。其后孙贻别求于龚孝升，使余得免于是非，幸也。’”（《黄宗羲全集》第1册，第375页）黄宗羲亦有诗忆此：“凭烟引烛烧残话，嘱笔完文抵债钱。（注：问疾时事。宗伯（钱谦益）临歿，以三文润笔抵丧葬之费，皆余代草）”（《黄宗羲全集》第11册，第261页）

⑥ ⑦ ⑧ ⑨ ⑩ ⑪ ⑫ ⑬ ⑭ ⑮ ⑯ ⑰ ⑱ ⑲ ⑳ ㉑ ㉒ ㉓ ㉔ ㉕ ㉖ ㉗ ㉘ ㉙ ㉚ ㉛ ㉜ ㉝ ㉞ ㉟ ㊱ ㊲ ㊳ ㊴ ㊵ ㊶ ㊷ ㊸ ㊹ ㊺ ㊻ ㊼ ㊽ ㊾ ㊿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59年版，第342、412、266~267页。

② 王士禛《带经堂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62页。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⑪ ⑫ ⑬ ⑭ ⑮ ⑯ ⑰ ⑱ ⑲ ⑳ ㉑ ㉒ ㉓ ㉔ ㉕ ㉖ ㉗ ㉘ ㉙ ㉚ ㉛ ㉜ ㉝ ㉞ ㉟ ㊱ ㊲ ㊳ ㊴ ㊵ ㊶ ㊷ ㊸ ㊹ ㊺ ㊻ ㊼ ㊽ ㊾ ㊿ 黄宗羲：《明儒学案》，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581、1079页。

⑥ 黄淳耀：《陶庵全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二三六别集类）第1297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30页。

⑦ 郭象升：《文学研究法》，余祖坤编：《历代文话续编》，凤凰出版社2013年版，第2005页。

⑧ ⑨ ⑩ ⑪ ⑫ ⑬ ⑭ ⑮ ⑯ ⑰ ⑱ ⑲ ⑳ ㉑ ㉒ ㉓ ㉔ ㉕ ㉖ ㉗ ㉘ ㉙ ㉚ ㉛ ㉜ ㉝ ㉞ ㉟ ㊱ ㊲ ㊳ ㊴ ㊵ ㊶ ㊷ ㊸ ㊹ ㊺ ㊻ ㊼ ㊽ ㊾ ㊿ 刘咸忻：《〈文史通义〉识语》，刘咸忻：《推十书增补全本》甲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066、1072页。

⑩ ⑪ ⑫ ⑬ ⑭ ⑮ ⑯ ⑰ ⑱ ⑲ ⑳ ㉑ ㉒ ㉓ ㉔ ㉕ ㉖ ㉗ ㉘ ㉙ ㉚ ㉛ ㉜ ㉝ ㉞ ㉟ ㊱ ㊲ ㊳ ㊴ ㊵ ㊶ ㊷ ㊸ ㊹ ㊺ ㊻ ㊼ ㊽ ㊾ ㊿ 全祖望：《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528、1410、977、1250、1807、2052、1339、1695、2733页。

⑤朱鹤龄：《愚庵小集》，《清人别集丛刊》影印复旦大学图书馆藏“金闾童晋之刊行”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386～387页。

⑥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57页。

⑦潘耒：《遂初堂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70册影印清康熙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12页。